至少从两个方面来看，本书的第三部分，“传统历史”的书写，显得有些寡淡。一是菲利普二世时代跨度不长（对于前工业社会而言的确如此），大事不多（相较于新教改革等“大事”），乃至于可供管中窥豹的事例似也未见（至少本书呈现给读者的是如此观感）。二，是相较于后来愈发多的历史作品，本书对政治史的写作就显得没有那么“吸引人”。

回头来看，本书最值得称道的地方，还是作者提出了一套史学的方法论，并用如此一本煌煌巨著为我们做了示范。在此我们不妨再复述作者写于结论中的话，本书代表了一次对于“整体的历史”的书写尝试，试图通过三个连续性的维度、三种不同的“楼梯平台”来书写历史，来抓住过去所有不同的、彼此之间有最大差别的节奏。作者同时也坦然指出了这种方法所具有的缺点：它的各个声部常常互相掩盖，但却没有任何一个声部能够永远使自己作为独唱被人承认、接受并把伴奏拒之千里。我们也可以为作者补充，指出更多可能的不足：愈是往久远的时代回溯，提供的资料就愈难以支撑全面地写作；并不总是能够找到贯穿在三个部分的主旋律，甚至有可能通过现有史料所重构的历史图景是破碎而支离的；“总体的历史”迫使作者要关注那些细碎的、甚至可能最终被证明是无关紧要、无关宏旨的事件、事实；以及，这样的书写可能篇幅过长，有用的内容却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越发淡薄。

在本书所实践的另一重要概念，即为所谓“长时段”（Longue durée）理论。在1958年，作者还另有专文《长时段：历史和社会科学》以仔细探讨这一理论。根据后人的概括，“长时段”理论的主要内容为“结构”与“时间”，长时段是各种结构、结构群的很少变动的、稳定的历史，同时时间上要区分三种尺度，短、中、长，其中作者尤其重视长时段的历史，故此一理论被称为“长时段”而非“三段论”理论。举一例子，本书第一部分中作者将山地居民和平原居民之间的紧张关系及其不同的文化和经济模式，描述为数千年来地中海历史的基本特征即是长时段理论的应用。

彼得·辛格评论马克思的一段话，也可以适用于布罗代尔以及年鉴学派：

现在，当我们思考社会以及阶级、经济力量的作用时，马克思的思想成为了我们思考背景的一部分。他的思想改变了历史和社会学的研究，并深刻地影响了哲学、文学和艺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现在都算是马克思主义者了。

无论是注意历史中长时段的变化、结构，抑或是从三个维度考虑历史的书写可能，还是关注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其他学科对于历史研究的作用，这些都已经成为当下历史学研究绕不开的方法，如今的历史学者，乃至人文社科学者或多或少都受此影响，而且后来一些严格意义上并非“年鉴学派”中人，运用这些方法也显得炉火纯青，大有青出于蓝之势。这就像人们可以不赞同马克思的观点，但他所提出的问题与关切却是与所有人息息相关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在大家都是“年鉴学派”的一份子了。而或许，正是“年鉴学派”在这一意义上的成功，促使了作为学派的“年鉴”的衰落，当然，后现代主义所具有的解构力量在这一过程中的影响也不可忽视。

就后学者而言，其实并不一定都要阅读本书，本书作为一种方法论的展示之作、“革命之作”的意义要大于本书作为对特定历史问题的研究。若只是为了把握这一方法，还有其他更为简易、直接的方式，毕竟，本书的篇幅还是太长了些。除非你对这一时期的地中海世界饶有兴致，或是有志于最真切的方式感受布罗代尔的笔触。